

輔 仁 大 學
歷 史 學 研 究 所 所 友
追 悼 文 章

感念 輔大歷史所教授 孟樹人 神父

王文霞 99.5.24

張四德老師打電話來告知孟神父去世（99.4.14）的消息，聽到後感到有點震撼，她說輔大將出版一本紀念孟神父的文集，希望我寫些懷念的文章。的確我這件事突然將我拉回到 30 多年前在輔大讀書的日子。時光倒流回到遙遠的記憶庫中，我們這群來自國內各大學的畢業生，進入輔大西洋史研究所後，在文學院圖書館前面排排照的景象，依然鮮活的歷歷在目。

孟神父是我認識的第一位美國神父，大四即將畢業前，去台北參加輔大研究所考試。由於當時成大還沒有設立研究所，自己對西洋史的興趣濃厚，也很希望藉此訓練英文能力，所以報考了輔大的西洋史研究所。台灣在 1970 年代的交通並不方便，我坐了 8 小時的火車到達台北，參加了筆試與口試。當時面試的教授是孟神父，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美國人，也是我第一次見到外籍神父，在成大我見過路德會丹麥來的外籍牧師，卻不曾看過美國人。他用中文問了我幾個問題，我很訝異他的中文說的如此好！包括我為什麼來考輔大的研究所，我的興趣和讀了那些書等。問題都很簡單，我自己覺得回答的不錯。放榜後，我被錄取了，也從此開始了我第一階段從台南到台北的留學生活。

進入輔大後，才知道他是當時研究所的所長，專門教授美國史，也是本篤修會（St. Benedict）的神父。當別人稱他所長時，他總是自嘲的說是「廁所」的所，逗得大夥兒哈哈大笑。我開始認識到美國人的幽默，也發現他這樣拿自己來開玩笑的作風，在中國老師裡是不可能的情形。當時台灣的大學老師們多是社會敬重的士林道士，道貌岸然的夫子模樣，若是有人膽敢這樣說老師，會是一種嚴重的冒犯與不敬。孟神父卻經常笑嘻嘻的與我們開玩笑，個性開朗幽默，使我覺得東西世界文化裡教授作風的差異，在中國人與美國人的日常生活裡就能夠感覺到，也更激起我追求了解西方文化的興趣。

孟神父教授美國史，來台灣有幾年的時間了，神父們受修會院長的管理，本篤會有幾位神父在台灣從事教育工作，都住在輔大後面貴子路接近泰山的修道院內。他們自成一個大家庭，且有專人管理家務。後來同學帶我去訪問神父們才知道修道院裡面所有的各種設備，廚房、餐廳、客廳、書房、祈禱室、花園的等等，有一位管家會照顧他們的生活所需。孟神父請我們吃了好吃的冰淇淋，這是我第一次吃美國冰淇淋，印象非常的深刻。這也是我第一次發現，還有人不結婚也可以生活得如此無憂無慮。過去我一直認為每個人都非得結婚，不然就像爸爸的老兵朋友一樣非常的可憐，不但沒人照顧，還常受人欺

負，晚景淒涼。這個觀察也使我看見了人類的生活另一面窗，人可有不同的方式來生活，不見得人人都要結婚。

在 1976 年左右的台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不久，接著蔣中正總統駕崩，經濟並不起色，社會到處瀰漫著不穩定的氣氛。當時的大學畢業生很流行出國，想出國的人多，真正能出去的人少。一方面政府對出入境都有管制，另一方面具自費出國能力的家庭也不多，公費留考的名額極少。讀輔大西洋史研究所的同學，多數都對西方文化很有憧憬，現實上又無法出國，能在輔大接受外國教授的教導，也是一種很了不得的薰陶。

的確，在當時崇尚西化的社會風氣下，神父們到台灣的教學，開啟了我們對西方文化認識的窗口。到台灣來的美國人其實不多，冷戰下的兩岸關係緊張，韓戰後美軍協防台灣，除了與軍方有關的人物之外，一般的外國人很少。孟神父因天主教本篤會的差遣，來到台灣輔仁大學教美國史。他也將美國大學的教學方式帶入，給當時的台灣學生一種很不同的激勵。

我的同班同學謝標澤，在大學時代就跟隨孟神父學習美國史，到研究所時，繼續追隨他寫碩士論文。因與孟神父相處時間較長，所以對他了解也多，不僅對他非常敬愛，許多方面也受他的啟發。他常提到孟神父對學生非常照顧，上美國史課

時，是用中文講授，希望學生聽得懂。但是他的中文似乎不太夠用，所以經常中英文並用。學生們為了解他的上課內容，也就必須課前先讀原文書，作上課的準備，這樣使得學生的英文逐漸進步，受益很大。

當時美國電影在台灣上映，票價很貴，也不是一般學生能夠常看的。美國史課程若遇到與課題相關的電影上映，孟神父會帶同學們去看。看完電影後，還會請學生們吃西餐。當時社會的一般收入都很低，看電影、吃西餐對學生來說是非常奢侈的大事，不僅消費價格昂貴，甚至如何使用連刀叉都不曾學過，充其量在電影上看過而已。每次聽美國史組同學談及他們上課的情形，經常引得歐洲史組的同學又羨慕、又妒嫉。大部分時間，歐洲史組的同學都只能乖乖的坐圖書館，啃豆芽菜的英文書。

我們班上只有 4 位同學，除了謝標澤讀美國史組外，其他 3 位同學：熊自慶、林麗珠與我都讀歐洲史組。因為人少，我們經常與前一屆的學長一起上課，他們有 7 位同學，一起修課加起來的上課人數也不少。後來本篤會有位讀歐洲史的柯立德神父，剛從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在 65 年加入輔大，使得歐洲史組同學士氣振奮，我則成為柯神父在台灣收的第一位研究生。這兩位美國史與歐洲史的神父平常與我們說中文，但上課時的教材都是英

文。大家寫的都是西洋史論文，再加上論文撰寫時的參考資料，幾乎都是原文書，由輔大文學院圖書館與神父們幫我們從外國採購進來。要完成一篇論文，都需要閱讀數十本的英文書。所以，從輔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學生，啃英文的時間是非常長的，3年下來，即使沒有出國，學生的英文也不得不進步。

輔大畢業後，我回到台南成大歷史系服務，不久與謝標澤結婚，孟神父、柯神父與王任光神父都參加了我們的婚禮，雖然是個台灣普通百姓的世俗婚禮，卻蒙受多位神父們的祝福，也是當時大家所稱羨的事。我們開始工作後的生活非常忙碌，尤其在南部定居後就很少北上，偶爾會去台北探望王任光神父，但很久都沒有看到柯神父與孟神父。聽說後來他們都陸續回了美國，在本篤會所屬的學校教書。我們學生們因為受教於這些美國神父，而開啟了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和更大的研究興趣。

在工作多年後，希望出國進修的我，終於勇敢的踏出了國門，到美國去真實的看看什麼是西洋文化，而對西方有了更多的新發現，豐富了自己的生命。我在輔大研究所，孟神父擔任所長的這一段時期，快樂的學習時光，成為人生中非常美好的記憶。經由孟神父搭起了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他所傳播的文化種子，多年後發芽，吸引許多年輕的台灣學生前往西方求學，許多輔大歷史所的同學日後都出國留學了。

到輔大讀書，開啟了我人生許多新的面向，也擴大了自己的國際視野。能受教於孟神父這樣學養豐厚、溫文儒雅的西方學者，感受他人格的薰陶，是一種很大的福氣。我經常感念無法直接報答神父對我們學生的照顧，但對神父的感恩，能轉化為善對週遭的人群，也等於擴大了神父的教導與慈愛。所以我認為神父不死，只是凋零，他愛學生的精神，經由他的學生將繼續長長久久的傳遞下去！

I feel so sad about Father John's passing. I called him a couple years ago. We had a very nice talk on the phone. I showed my appreciation to him for his teaching.

Especially for when he spent the whole summer vacation training us in English when we were in graduate school. I really miss him so much. Thank you for your invitation to Father John's Mass. However it is too far for me to participate. I am sorry to say this.

Rachel 王全珠

《又有一位恩師走完人生的旅途》

王芝芝記於輔大歷史系研究室 2010/05/23

一個月前接獲孟樹人神父過世的消息時，我百感交夾，久久不能自己，竟然在課堂上，當著錯愕的學生們面前，咬緊嘴唇，淚流不止。其實，孟神父因為心肺衰竭，依靠鐵肺支撐生命已有多多年，對於一位平日好理事，四處照顧信友的神父，這種長期困駐醫院的生活，只能說是靈魂的試煉。有天主信仰的人都知道，應當為他的離去，感激天主的恩典；因為他不只是解脫受盡折磨的病體，其實也是完成了侍奉天主至誠的神職人員當初與天主訂的神契，駕歸天國去了。是的，我應當感到心慰，可是，心中還是有諸多不捨；因為他在我年青成長的路途上，曾經是那麼重要的一位引路人。

我所認識的孟神父就像他的中文名字 - 樹人一樣，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教育家，一位博學，又有愛心的老師。第一次見面，是 1967 年在碩研新生英文暑期研習班上，這位白裏透紅、金髮、高大的愛爾蘭裔神父，對著我們這群中國學生，絕不鬆口懂得中文，迫著我們直接反射講出英文句子。我們中間有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都是生平第一次在公共場合聽到自己說英文的聲音。整個暑假，這群不可教的學生在他的英文震撼教導下，竟然可以開口說起英文來，像是在講一種很難的方言，毫

無顧忌大膽地說，儘管文法根本是錯的。神父是我們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教的是把門的必修課 - 「史學方法」。在四十多年前，台灣歷史學界，並不看重方法，也不是很在意專業論文的格式，大學裏，罕少開設這類課程，遑論讓學生實際地操作史學基礎方法。孟神父是我史學專業生涯的啟蒙老師，一年的研習下來，我有一種脫胎換骨的感受。近年來，輔大歷史系指派我在研究所裏開設「獨立研究與史學寫作」的課程，我常常在課堂上，被我那群令人「頭炸」的學生，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有時候彷彿看見神父與我同在，常常想起他被我那可怕的英文作文折磨得，一根煙接一根煙不停地抽，最後，收起筆，猛地站起來，對我一笑，大聲地說「OK!」。四十多年來，就是這句「OK!」，伴著我，克服多少挫折，讓我一路走來，從不知後退。

研究所二年級的寒假，孟神父帶著全所的學生，參加救國團舉辦的「橫貫公路徒步旅行」。我們由阿里山啟程，翻山越嶺，走到花蓮。一路上，每天早上，神父都會找一個清靜的角落，以天為祭壇，為我們做一臺彌撒。當我們走到橫貫公路的至高點 - 慈恩塔，那一天，彌撒禮成後，孟神父告訴我們，他在祭壇用的聖杯，鑲著母親結婚戒上的鑽石。我在那一剎間，感受到神父的母親對兒子的愛，以及她對天主的信望，她

將自己執愛的兒子獻給天主，讓他帶著愛來到我們這方小島。多年後，我在倫敦大學的課業告一段落，在回家的路上，我決定繞道美國，去探望已經被本篤修會調回 Latrobe, St, Vincent College 服務的神父，神父帶著我拜見這位偉大的母親，他的姐妹(有一位是修女)，以及前幾時也過世的弟弟(美國的眾議員)。我在神父的家人身上，學到的是，任何一本書都沒法教我的西方文化，我是何其有幸能享受到這個虔誠的家庭從遠方稍來的愛。在合歡山上，我第一次看見滿山白雪，讓我一生最難忘的是孟神父教我們打雪戰，那時我私心做了一個決定 - 有一天，我要到一個冬天看得見雪的地方。我也跟神父說了自己這個小小心願，神父說:「Yes, Gigi, you will!」。以後的日子，只要見到雪，我就會想起神父，想起他給我的鼓勵，以及他幫助我申請出國進修的種種恩情。

我攤開紙，想寫一段文字，來悼念我的恩師，竟然只能涓涓點點地回憶，怎麼樣也說不完我心中感恩之情，只能說，筆未盡，淚滿襟。

忘不了的背影：感念孟樹人神父

周樑楷

輔仁大學歷史系第三屆系友
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第四屆所友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

今天是 Fr. John (Rev. John Murtha, OSB; 孟樹人神父) 八十歲冥誕，也是他辭世回歸天鄉的第四十四天。大家相聚一堂，除了感念恩師，也可以藉此撫今追昔。

其實，這一天的來臨四德和我老早就有了心理準備。幾年前(2004)的暑假，我們偕同女兒序諦專程開車到 St. Vincent, Latrobe 拜訪他時，心理就留下了這個陰霾。他強打起精神跟我們聊了一陣子，隨即敦促我們離去。臨別的那一幕：他揹著氧氣筒，分別和我們擁別後，一語不發、立刻掉頭轉身，緩緩走回修道院的宿舍。真是相見時難別亦難，情到多時轉無情！Fr. John 寧可用背影說再見，也不願他在我們心中永遠留下充滿離愁的眼神或淚水。

一九六九年九月，在服完預備軍官役後，我滿懷期待重回輔大，就讀歷史研究所。這是國內第一所、同時也是唯一的以研究西洋史為主的學術單位。一九六六年研究所正式成立招生，就在這一年，Fr. John 和 Fr. Claude (Rev. Claude Pollak, O.

S. B.柯立德神父) 兩位美國聖本篤會的神父來到台灣，並且在輔大歷史系任課。大三時，我選修了 Fr. John 講授的美國史。相對於 Fr. Claude 的勇氣和健談，Fr. John 在語言表達上比較謹慎害羞，沒有把握的中文詞句他絕不出口。所以，上課時他都以英語教學。而我們學生卻「有聽沒有懂」。反正規規矩矩地勉強聽下去，一週又一週的過著。印象中，這門課最重要的關鍵辭就是”American Mind” 和美國是個“pluralism”的社會和文化。那時候的 Fr. John 還很年輕，待人又親切，有時還陪我們打籃球。大四那一年，我負責編輯本系的畢業紀念冊，特地挑選他身著運動 T 恤、手抱籃球的照片，與其他正襟危坐的師長並列，形成有趣的強烈對比。

回輔大歷史研究所後不久，我主動請 Fr. John 擔任指導教授。起初他非常訝異且不以為然，因為我強烈表達對研究西洋史學史及史學思想的意願，而且準備以當代英國史家 Herbert Butterfield 為碩士論文的題目。這些都不屬於他熟悉的領域。我懇求地說：「全台灣幾乎沒有任何學者主修西洋史學史，我選擇從英國入門，但是英文閱讀能力有限。每當我讀一本 Butterfield 的著作，請 Fr. John 跟著閱讀；而後我再口頭報告並且討論。至於理論方面的問題，我自己先摸索好了。」也許初生之犢不畏虎，這樣的決心感動了他。日後，我們師生就一

本一本地磨下去。他總是很有耐心地傾聽、不斷給我鼓勵。

就讀研究所期間，王任光神父曾經休假一年，由 Fr. John 代理所長。由於他每天上班，和同學接觸的機會增多。師生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我們和他開玩笑的勇氣也與日俱增。有一天，莊尚武兄和我要他學點台語，他一句一句跟著唸，十分開心的樣子。我教他用台語說「猴囡仔」，他也跟著唸，然後問那是什麼意思。我們說很難翻譯，勉強可以說成”Monkey boy”吧。隔了幾天，他居然反擊，用「猴囡仔」一詞叫尚武和我！結果大家笑翻了！

一九六九年美國西部片「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Sundance Kid) 上映。Fr. John 最喜歡其中的主題曲(Rain drops falling on my head)。上班時，如果從走廊隨著他的腳步聲傳來這首曲子，我們就猜想他今天的心情不錯。如果所長辦公室忽然傳來這首曲子，我們就知道他已經處理完公務，等一下大家就可以跟他開開玩笑了！

雖然研究所的圖書室裡經常洋溢笑聲，但是更多的是嚴肅和認真的時刻。記得為了撰寫報告，Fr. John 請了一位本篤會的美國修女，免費教我們英文打字，她一板一眼的，要求我們雙手敲打鍵盤時，一定要傳出合乎節奏，有韻律的聲音。Fr. John

本人教一門史學方法的課，特別在意註解書寫的規格；任何一個標點符號或空格都不得馬虎。每當他一一檢查整篇報告的註解時，我們都格外小心，因為終於又見識到另外一面的 Fr. John。

一九六九年，研究所為了加強美國史的份量，特別成立「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部門，由 Fr. John 負責。他陸續採購不少英文原版書籍，也經常與美國新聞處(USIS)連絡，為所裡爭取不少資源。從那時候起，所裡的研究生更投入美國史的領域，有的特別喜歡「進步主義時代」(the Progressive Movement)，有的選擇了美國史學史。四德比我晚進研究所，她原來就偏愛美國史，在我的慫恿之下，她以美國史學之父 George Bancroft 為題，當然也請 Fr. John 指導論文，不做第二人想。

至今自問，四德和我在所裡求學，最大的、最可貴的資產是什麼呢？我們都認為「真摯」(sincerity)是這個研究所的傳統精神。凡事以真摯的心面對，尤其在學術的殿堂上。Fr. John 並非這個所裡唯一的典範，但是他的風格影響我們一生，甚至展轉傳給我們的孩子和學生。一九八八年 Fr. John 擔任 St. Vincent College 校長時，美國匹茲堡(Pittsburg)一家報紙(Post-

Gazette)訪問他：「哪三個字最能刻畫你自己？」Fr. John 回答道：「Committed, kind, impatient」這三個字他從未跟我們學生說過。第三個字是他自謙的話，前兩個字卻在有形無形之中深深的影響了我們。

研究所那三年，與 Fr. John 生活在一起有太多太多甜蜜的回憶。每個人一定忘不了到泰山腳下本篤會尚義院開會、喝可樂、大口吃冰淇淋的故事。又如，有一年的冬天，我們組隊參加救國團主辦的中部橫貫公路徒步旅行，七天之中，Fr. John 和我們共享大禹嶺的雲海、九曲洞蜿蜒的深谷美景。我們都感覺到，”Fr. John was always ready to share a good story and good laugh”.

畢業後，因任教關係，家住台中。雖然遠離台北，但是常有機會和 Fr. John 見面；心裡也一直認為他永遠屬於台灣，屬於輔仁大學。可是，一九七七年忽然傳來晴天霹靂的消息，說他奉命調回 St. Vincent，而且從此可能不再回台灣服務。一時之間，真不如何適應！和同學見面時，大家都表示挽留之意。他除了露出遺憾和無奈之外，也告訴我們應該適應人間種種的悲歡離合。這時候，我們深深體會到他永遠服事著天主的意願。

一九八零年的秋天，我首度出國留學，到水牛城(Buffalo,

New York)讀書。Fr. John 非常高興我有一位史學界的名師指導。隔年春假，我迫不及待的搭乘巴士，從水牛城到 Latrobe。那幾天他抽空陪我參觀修道院和 St. Vincent College。逢人必說我是他的學生，來自台灣。修道院和 St. Vincent 位於一座山丘上。遠觀教堂十分雄偉莊嚴。有一回，我們沿著教堂後院的小路蜿蜒而上，不知不覺來到墓園，沿著小路的兩旁，黑色十字架一個接著一個，乍看之下，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是花園的小護欄。。Fr. John 告訴我，這些都是修院的神職人員，依時間先後排序下去；將來他也會跟著排隊。說完他就「哈哈！」大笑了兩聲。

第二次出國讀書期間，我們有了自己的車子。序樺和序諦從小在台灣也和 Fr. John 見過面。我們一家四口利用春假開車前往 Latrobe。這回人多熱鬧，兩位小女孩和 Fr. John 特別投緣，話說個不停；反而我被冷落在一邊。他還帶我們拜訪他的妹妹，吃了一頓自家烹調的義大利千層面、參觀附近一座白人對抗印地安人的要塞、而後又一齊到匹茲堡城裡參觀；感覺上如同相是跑馬燈似的團團轉！這幾天，Fr. John 就好像他在台灣一樣，有時忙東忙西、席不暇暖。怪不得他說自己「缺乏耐心」(impatient)。

二零零四年是我和 Fr. John 最後一次見面。零三年夏天，四德和我在美國波士頓哈佛圖書館忙著蒐集資料。長途電話中聊天時，我感受到他已不再健朗如昔。我們約定隔年夏天專程前往探視。零四年夏天，四德、序諦和我從水牛城輪流開車，依約準時到達 St. Vincent。修道院神職人員宿舍的管理員卻說 Fr. John 不在。這件事似乎透漏了不平常的訊息，不像他平日的作風。我強調我們來自台灣，是他的學生，已經約定了見面的時間，至少也要知道他現在身在何處。其實我們內心擔憂的是，他是否突然病情惡化了！後來得到的回音是：隔天早上九點在修院門口與他見面。

清晨 Fr. John 終於準時現身！他顯然老了！背也彎了！臉上充滿病容，肩上揹著氧氣筒；然而全身穿著神父制服，整整齊齊的。這時候我明白了，他總是要把最好的形象留給我們；昨天爽約顯然身體欠安，不便會客。我們陪著他、護著他，走到修道院的餐廳進餐、聊天。他不時流露笑容，我們卻陣陣的心疼！大約一個多小時，他要回房休息了。於是，我們陪他走回宿舍門口。最後，他用他的背影和我們說了再見！

從前，我們一直從正面迎向 Fr. John、從他的笑容裡學習他的慈愛(kind)、堅持(Committed)和真誠(sincerity)。沒料到在生命的終點，他卻用背影傳達了這種風範！莫非天意指點我們，追隨著他那令人永遠忘不了的背影！

悼念孟神父

涂永清

4月中，張四德老師掛電告知：我們敬愛的孟神父已蒙主寵召，並將於月底舉行追思彌撒，這一消息令人十分震驚，而我就讀輔大歷史所時（1968-1971年），孟神父的點點滴滴也頓時在眼前晃動，在此謹記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剛考進研究所時，所長王神父（懷堂）為提升我們的英文能力，研究所任教的教授們犧牲假期，大熱天輪流教我們會話、作文，包括如何撰寫學術論文，印象中王神父給人的感覺較嚴，而孟神父則十分和藹有耐心。

由於我是美國史組的學生，所以與孟神父的接觸也較頻繁，記得研一結束將上研二的暑假期間，志堅與我曾在「田心雅」租屋，交通十分不便，而某天夜晚，志堅突然身體不適，我立刻趕到尚義院請孟神父幫忙。志堅表示其妹在台灣療養院（今台安醫院）擔任護士，希望到那裡就醫，於是 Father John 開著他的招牌車——金龜車載著志堅前往就醫，不久得知志堅罹患胃潰瘍大家才鬆口氣。

在輔大求學期間，台灣經濟雖已開始起飛，但尚未脫離貧窮，而學生生活仍然很苦，因此每年在尚義院的聖誕大餐對我

們就具有非凡的意義，材料由我們班上頗有廚藝的志堅提供尚義院採購。餐後尚有餘興節目。研三，我們搬到泰山貴子村，距尚義院院僅一條街，因此我們到尚義院的次數也較多，每次去拜訪孟神父時，他都會請我們喝福樂牛奶，當時台灣生產的鮮奶只有福樂與味全，而價格頗昂貴，因此能喝到鮮奶，尤其是福樂可說人生的一大享受，今日台灣鮮奶品牌繁多，但我每次購買福樂時，都會想到孟神父，並與家人談起這段往事，而她們都會笑我痴並說我老愛講天寶舊事。謹以此小文悼念永息主懷的孟神父。

追憶孟樹人神父二、三事

莊尚武

四月十九日返台，內人告知孟樹人神父已病逝美國，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一旦成真，難忍不捨之情。

回想民國五十九年考入輔大歷史研究所，受教於孟神父，到今年剛好整四十年於茲，期間孟神父出任歷史研究所所長職，對所有研究生都關懷備至，照顧有加，最令人難忘的是每年聖誕節或感恩節都邀請大夥到他的修院——尚義院慶祝，請大家好好吃一頓，飯後甜點，由美國直接運來的冰淇淋更是大家的最愛，當年師生相處的融洽與和樂不時回到我的夢裡，是那麼溫馨，那麼令人回味！

孟神父身材瘦長、背微駝，有著愛爾蘭人特有的紅潤臉龐，永遠面帶微笑讓人如沐春風，隨身帶著黑色的皮包，總是噓寒問暖，最常對我使用的見面語是：「O...Owen Baby!」親切又顯赤子之心。他也常率大家出遊散心，或到修院避靜，使我們得以舒解課業壓力。有一次還一起報名救國團舉辦的橫貫公路健行，師生日夜相處數日，使彼此感情更是拉近，有如一家人。還有一次大夥一起南下，先到清水周樑楷同學家，再參觀林立樹同學父親主持的一個大工程，然後到高雄舍下。總而言之，在繁重的課業下，不忘給我們身心的調劑。

後來，孟樹人神父奉聖本篤美國總會之命，返美出任總會會長，並兼任聖文森學院（St. Vincent College）院長職務，期間，內人與我分別獲得獎學金、國科會獎助到賓州州立大學與賓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們抵美第一站，便是芝加哥機場，孟神父從 Latrobe 大老遠開車來接我們，安排住在聖文森學院幽美靜穆的校園裡，並在百忙中請其弟、妹帶我們夫婦到處遊覽，並拜見高齡的孟媽媽，使我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孟母的慈祥令人難忘，最後神父又開了幾個小時的車送我們到賓州州立大學，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有很多人可以代勞，他卻仍親自接送我這個學生，使我不知如何言謝。

孟神父教學認真、幽默，上過他「美國史專題」及「史學方法」二門課，使我終身受益，尤其「史學方法」紮下以後我寫學術論文一絲不苟的基礎。孟神父對學生的作業或報告批閱十分仔細，總是與每一個研究生個別討論呈交的作業，他很有耐性且不厭其煩的與我們討論，使我們不敢馬虎。他確實是我的一生當中的貴人。再看他離台返美前送我的一幅玉照，他依然那麼慈祥，睹物思人，不勝歎噓，而懷念之情也更為殷切。

如今他永息主懷，一生的風範，卻長留我心。

A letter to Father Join

Dear Father :

兩年前，感謝系裡同仁的支持，我從成大回到母校任教，也讓我在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可以稍稍回饋過去師長的栽培。我也決定盡己所能，增進學生的見解和視野，尤其是面對國際化的新局面。如今，看見學生稚嫩的臉龐，我彷彿看見當年座椅上的我。

Father，在我啟蒙的年紀，有您和王任光神父的培育和指導，是我一生之中最幸福的事！

您跨越了種族、文化和宗教的藩籬，用無盡的上帝之愛培育我們：待人寬厚(kindness)和對學術的執著(commitment)。

為了感念您無私的奉獻，去年（2009）我邀請台灣幾位美國史研究同好，籌劃《輔仁歷史學報》第二十五期為「美國史專刊。」台灣師大的王秀惠先生，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俞彥娟、黃文齡先生，社科所的湯熙勇先生，以及東吳大學的盧令北先生等學者慨然相允，讓我衷心感激。

然而，書尚未成，您已回歸天家！期刊的抬頭只得由『感念』改為《孟樹人神父紀念專刊》（*In Memory of Rev. John Murtha*）！

Dear Father！此刻耳際似又響起您爽朗的笑聲！感謝您，Father!

作者是輔仁大學歷史系所畢業 現任教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張四德

Remembering Fr. John

When I was a senior in high school at the St. Vincent Preparatory School in 1960, our teacher for speech was a young and dynamic priest by the name of Fr. John Murtha. He had just completed his MA in American histo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was soon to begin his doctoral studies at Catholic University. It was a great class and left a lasting impression on me in terms of the need and importance for effective verbal communication, at which Fr. John so excelled.

Little did I know at that time that six years later I would be in Taiwan at Wimmer Priory with Fr. John, as well as Fr. Claude Pollak and Fr. Paul Maher, all teachers at very new re-established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Fr. John spent much time introducing me to life in Taipei, for which I'm ever grateful. I recall, too, very vividly the car he had at the time and how much he enjoyed driving around the city, or giving a ride to whomever might need one.

One of my clearest memories of Fr. John at that time was the care he showed for his students in the Fu J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He spared no effort in helping his undergraduate and then graduate

student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American history but also to learn what it means to be a mature, responsible human being.

The years Fr. John was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965-1977) were very special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Fu Jen. The university was young, and many of the professors were young as well. It was also a time when there were many priests and Sisters teaching at Fu Jen. Fr. John was especially effective in bringing together the Chinese diocesan clergy, the SVDs, and the Jesuits who taught at Fu Jen for occasional celebrations or a trip to another part of Taiwan.

After Fr. John had returned to St. Vincent Archabbey in 1977 and later became President of St. Vincent College (1985-1995), he was asked in an interview to use three words to describe himself. He responded with “Committed, kind, impatient.”

During his stay in Taiwan, Fr. John was indeed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first-r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e spared no effort in doing the best he could under what at times were ver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His “kindness” was shown in his great concern and

care for his students. As for his “impatience,” those who have spent time with him will remember well this aspect. Fr. John had no patience for those who would only talk and not act, or for those who would say one thing and then do another, or for those who would not take seriously what in fact was a very serious matter. Fr. John’s standards were the highest, and he had little patience for those who were not willing to work to bring these standards into reality.

If we want to remember Fr. John, let us remember these three qualities of him. And, let us, as students of Meng Shu-jen, see if we can learn from his example and be committed, kind and impatient.

One of Fr. John’s students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was Lin Li-shu, who was especially devoted to Fr. John, and served as his teaching assistant. Lin Li-shu too had commitment, kindness and impatience. Perhaps it came in part from Fr. John. We can only imagine that the two of them are together now in a much better world awaiting for us one day to join them.

Bro. Nicholas Koss

May 20, 2010

Words cannot express my sorrow on the passing of Father John. Fu Jen was very fortunate to have a dedicated educator such as Father John at the time of its founding over forty years ago. My classmates and I were the first graduating class of Fu Jen, and seven of us were the very first students in the graduate program, managed by Father John. We fondly called ourselves the first arrivals, and Father John cared deeply about our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He helped us navigate the academic process, and his thoughtfulness, patience, sense of humor, and willingness to work with each of us to develop our potential was truly remarkable. Father John was a great teacher, because he did not just give lectures, but rather set a standard of excellence for pursuing knowledge. He inspired his students to excel. I recall early on that he pushed us to be diligent in research methodology, ensuring that we presented our papers with correct citations and helping us sharpen our analysis and findings. These skills have helped all of us succeed, even as some of us pursued Ph.D. degr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was also a great advisor and friend. When some of us continued to pursue advanced degr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ather

John introduced us to his family. I recall the very first Christmas I sp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with his mother and his siblings' families. Over the years, he continued to be my mentor, always wanting to know my progress in my career and never failing to drop me a note when he had time. His departure has truly created a void where there was once a thoughtful and calming voice to guide me and give me directions. He will always be in my thoughts and prayers.

It would be a fitting tribute to Father John if all of us, his former students, would be willing to pool our resources together to create a scholarship fund in his name for future students at Fu Jen to pursue advanced degr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my hope that Fu Jen University will help us achieve this well-deserved recognition of a great teacher.

Emily Y. Ashworth, Ph.D. 楊蓉珍

Father John's eulogy

by Grace L. Yeh

First of all, we all share the sad news of Fr. John's passing; I was asked from Tse Jeng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Fr. John since three of us: Martha, Ke-Ching and I had visited him in October of 2007.

After I spoke with Martha the other day, I felt that I have an obligation and the honor to tell this short story of our trip with pictures for the upcoming memorial ceremony. I'd also like to share some memory with my class mates or some one whom have known or been taught by Fr. John.

Both Fr. Claude and Fr. John were Pennsylvanian; Fr. John had taken the helm as president of St. Vincent University at La Trobe, Pennsylvania after he went back from Taiwan. When they took their teaching mission to Taiwan, they went to Hsin Chu Language Academy for two years to study Chinese culture, customs, and learn to speak Chinese prior to teaching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One of my first vivid memories about Fr. John was the first day of his class; he was a slim, tall man with a pair of deep blue eyes, dressed in a Catholic Priest suit entering the class room. He pulled a chair and rested his right leg on it; and said:” good morning! I am Fr. John; we are going to study American History”. We went silent! As I said to myself, we are “dead meat for sure” because the class will be taught and tested in English, “oh, my god”!

Had we followed Martha’s plan several years earlier; we would not have missed the opportunity to see Fr. Claude. Finally, a trip to visit Fr. John was scheduled. Martha and Ke Ching left Orlando for Pittsburgh one day earlier, and picked me up on October 27. We drove one and a half hours to La Trobe. The 1000-acre compound set on a hill top were where St. Vincent University, St. Vincent Archimandrite, church, dormitory and cemetery were located. Fr. John was in a wheelchair and carrying portable oxygen when he greeted us 30 years after we met.

Fr. John was so thrilled about his Taiwan students' visit. Almost everyone recognized us as he proudly announced our visit. We were served a formal dinner in a private dining room by a servant; we were treated like honorable diplomats, even though we were the only table of diners in the room. We chatted, laughed, and talked of our younger years and Fr. John even showed off a couple of Chinese idioms (surprisingly, he knew much more than we realized). Wine was served (how can he missed that?) and we were told the dishes were prepared and cooked by the best chef in town; fresh mango ice cream was the desert.

Next day morning, 28th, after breakfast, Fr. John led us to the cemetery where Fr. Claude rests. Fr. John said their birth year and month are the same; but only one day apart. It was about noon that we needed to catch our flight and we were so sure that we will be back to La Trobe to have another visit. However..... That was not to be.

Although our trip lasted less than 24 hours, I hope and believe that was one of the best and happiest times in Fr. John's life; and certainly it was mine!

I'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offer special thanks to Martha and Ke Ching: without their arrangement and efforts, the trip would not be possible as we have now lost the chance to visit Fr. Claude. In addition, maybe some of you don't know that my name "Grace" was given by Fr. John. He set a bar and guides me to honor this name and fulfill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Thank you, Fr. John! Please watch over and bless us till we meet again!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鄧世安

乍聞孟神父過世的消息，這句話自然從心底浮現出來。

孟樹人神父是美國人，本篤會會士，也是我進入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時的所長。

我於一九七六年進入輔仁歐洲近代史研究所就讀。那個時代之輔仁歷史研究所的三位師長——王任光神父、孟神父、柯立德神父——在我們眼中，如同三位一體的支柱，彼此配搭、合作無間。他們都是神職人員，都沒有自己的家眷，卻把我們這些學生們當成了他們自己的孩子一般。那一種氣氛和光景，至今追想起來仍感甜美溫馨。尤其是對我這一個剛從英文系來的學生，那一種的家風實在讓我感到有一點兒受寵若驚。當時輔仁的英文系多外籍教師，大學部的課程與教學使我們頗受歐美式之學風的薰染，講求自由的風氣，富有個人主義的色彩，自有其迷人之處。但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比較淡漠，身居其中有時難免感到孤寂、落寞。然而，當我一進到輔仁歷史研究所，立刻感受到一種和樂融融的氣氛。孟神父好像是大家長一樣，師生、同學朝夕相處、關係親切，全所如同一個大家庭。

在課業方面，我當時只修過孟神父的史學方法。還記得有一次上課，他要我們作註解和書目的習作，並且很篤定的說，他在每一個作業中都可以找出至少五個錯誤來。後來，果真的如他所說。可見當初他訓練我們是很嚴謹的；而他的經驗也是十分老到的。然而，因為他教美國史，而我學的是歐洲近代史，所以就不像美國史組的同學們和他有較多接觸的機會。

孟神父和柯立德神父的隨和親切、平易近人不同，為人比較莊重嚴肅、不苟言笑。如果有事去找他時，我都得先整肅儀容、調整一下心情，想好該說些什麼，免得到時候緊張得不知所云。但是，這又不表示學生們和他有隔閡。同學們在所裡都慣稱他為「Father John!」；而他也真的像父親一樣照顧我們。他對我們總是諄諄教誨，為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基本功夫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此外，他更會積極的為研究所的圖書館增取圖書設備，並且為同學們申請獎學金或找尋出國學習的機會來往奔走、不遺餘力。

在我印象中記憶最鮮明的是每天他下班的時候，一定會走到我們當時會議廳式的研究室門口，手臂下夾著公事包，探頭進來，用他那關切又慈祥的眼神掃視我們，並語帶稱許的說：「Keep in busy? Hah!」於今回憶其音容笑貌猶在眼前。在他那

慈愛的目光背後，我感受到那種對學生真摯的尊重與關懷。這也使我覺得備受呵護，無形中加強了我學習的動力。

還有，最令人不能忘懷的是那時候的聖誕聚餐。我們在校師生和一些已經畢業的學長們會齊聚一堂，在尚義院（本篤會在泰山的修院）不僅飽餐豐盛的美食，也享受輔仁歷史研究所這個大家庭的團圓之樂。那時，我們可以堂而皇之的一窺本篤會修院的堂奧，親身感受這歷史上最悠久之修院的靈性特質。而許多以前只聞其名而未謀其面的學長們也會分享他們就業、做事的經驗，或回憶他們以前和師長們讀書學習時的種種趣事，令我們這些後生晚輩，如沐春風、受益良多。那時每次的聖誕團聚，真是師生盡歡，令人流連忘返。

隨著孟神父過世，三位輔仁史研所的師長都已歸返天家。悠悠思念縈繞胸臆，難以消散。然而，在這追思的過程中我並不傷感師長們的離我們而去。一面，我相信復活，那日我們會在榮耀裡再相見；另一面，我多少也感覺到這些已經逝去師長們的精神並沒有離開我們。反之，我似乎可以在我自己的思想言談、行動舉止之中察覺到他們那時所教給我們的知識與榜樣。人生也有涯，然而人生命所樹立的典型卻能如此代代相續、生生不息。